

冯惟敏论稿

冯荣昌 著



中国戏剧出版社

序

韩 伟

冯荣昌先生的《冯惟敏论稿》，是他积多年苦心研究的重要成果，也是截止今日学术界研究冯惟敏难得一见的学术专著。由于荣昌先生是临朐冯氏之后裔，他的研究，不仅资料翔实，细致入微，有我们所不曾见到的新鲜资料，因而其评论解说，更显准确可靠，而且由于其家族血缘的关系，文中不时流露出的真挚深情，亦令人感到亲切可敬。

冯惟敏，是明代第一流的散曲家。他的散曲集《海浮山堂词稿》，上承元代前期散曲作家的优良传统，充分发挥了北曲豪爽奔放的特色，即任中敏所说：“冯氏散曲，最有生气，最有魄力，为明曲中仅有之豪放一派。”他的散曲，语言通俗，气韵生动，题材广泛，内容丰富，他把揭露社会弊端、鞭挞政治黑暗、讽刺官场丑恶和同情人民疾苦等积极的社会内容注入曲中，极大地增强了散曲的生命力，提高了散曲的社会性和战斗性。冯曲这一特点，不仅在明代与那些模拟古人、刻镂文字、讲究格律的平庸之家难以同日而语，即使在元代与那些著名散曲家相媲美，也绝不逊色。

冯惟敏还是优秀的剧作家和诗人。他的剧作《不伏老》与《僧尼共犯》，他的诗作《冯海浮集》等，都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深厚的社会内容。倘若我们将他的曲作、剧作和诗作联系起来，结合他生活的时代，加以系统地深入广泛地理性论析，那么，我们既可清

晰地了解作家坎坷的一生之路和思想发展,更可通过作家而深入了解明代社会中后期的社会现状及其发展。而这一点,尤其通过散曲的研究了解这一点,则是我们过去忽略或做得不够的。冯荣昌先生的大作,也正是在这方面,做出了突出的成绩,甚而可谓填补了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方面的一个空白。

一九九九年四月六日于烟台师院

目 录

序	1
第一章 冯惟敏生活的时代	1
第二章 冯惟敏的家世与生平	9
一 冯惟敏的家世	9
二 冯惟敏传略	20
三 冯惟敏生平年表	23
四 冯惟敏生平五事考辨	33
第三章 冯惟敏的文学观	40
第四章 冯惟敏与文人的交谊	46
第五章 冯惟敏的文学创作	54
一 冯惟敏的散曲创作	54
(一) 冯惟敏散曲思想内容浅析	54
1. “忘身许国非时调”	55
2. 年年岁岁忧黎元	59
3. 大义凛然揭丑行	63
4. 体察入微话人生	71
5. 山林田园乐趣多	74
6. 含辛茹苦育子侄	78
7. 正青春人在天涯	80
(二) 冯惟敏的散曲艺术	84
1. 现实主义的杰作	85

2. 多姿多态写人物	87
3. 嬉笑怒骂任嘲谑	91
4. 锦上添花重修辞	99
5. 浅易流畅语言美	116
(三) 冯惟敏散曲的艺术风格	119
(四) 冯惟敏在散曲史上的地位	129
二 冯惟敏的杂剧创作	135
(一) 漫谈《一世不伏老》杂剧	135
(二) 漫谈《僧尼共犯传奇》	140
三 冯惟敏的诗歌创作	147
(一) 冯惟敏诗歌思想内容浅析	147
(二) 冯惟敏的诗歌艺术	156
附录一 《一世不伏老》详注	164
附录二 《僧尼共犯传奇》详注	200

第一章 冯惟敏生活的时代

处于封建社会末期的明代经济,经过十五世纪的繁荣和十五、十六世纪的社会危机,到十六世纪中叶以后,又继续发展,趋向繁荣,尤其以工商业和城市经济的发展更为显著。商品经济的发展,相应地刺激手工业的昌盛,至嘉靖万历年间,纺织手工业兴起,手工工场出现,制瓷和矿冶的进展,造纸和印刷发达,手工业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当时已能制造长四十丈阔十八丈的大船,供航海用;官营冶铁业已可年输七百八十余万斤;景德镇瓷器官窑年产四万四千三百余件。还出现了一些手工业中心,如苏州的丝织业,景德镇的瓷器制造业,松江的棉织业,遵化、佛山镇的炼铁业,无锡的印刷业等。民营手工业工场也已涌现,苏州纺织业已出现“机户出资,机工出力”的现象。这些都说明,当时的中国,在某些地区(如东南地区)、某些生产部门(如各种发达的手工业)中开始萌发资本主义的经济因素,标志着中国社会在缓慢地发展中开始步入历史的新时期。具有深远意义的是,随着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促进了城市的繁荣和市民的激增。当时南京人口已逾百万,北京人口也已逾六十万,即使太原都“繁荣富庶不下江南”,此类大城市已出现三十多座。正是由于城市的增加和市民阶层的壮大,致使商品经济开始冲击封建社会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市民力量开始与封建地主官僚进行较量,这反映在文化领域中即出现民主平等、个性解放及市侩化等市民意识的抬头,同时也促使那些迎合市民审美心

理需要的小说、戏曲和讲唱文学随之盛行。

冯惟敏生当正德、嘉靖、隆庆、万历四朝，写作期主要在嘉靖、隆庆两朝，那正是明朝由盛转衰的中后期。从正统以后，皇朝逐渐衰弱，统治者的反动本质愈来愈明显，他们对全国人民进行毫无限制地政治压迫与经济掠夺，更加贪婪、残暴和腐朽，宦官专权，吏治黑暗，社会矛盾日趋尖锐。

武宗即位，疯狂地掠取民田，一方面大肆修建皇庄，一方面把大量土地分赐给贵族、宦官。他还在京城内外开设皇店，掠夺民间工商业。武宗的宫廷生活，更是纵欲贪色，荒淫无耻。多次刮取“太仓”存银，户部为弥补亏空，不得不加收赋税。他又别构院御，建宫殿数层，造密室于两厢。在宫内挥霍淫乐犹嫌不足，还藉口巡边，抢占民间妇女和财宝。

武宗以亲信太监刘瑾掌司礼监，邱聚、谷大用提督东西厂，张永督十二团营兼神机营，让他们掌握重要的特务组织与“警察”机构，加强对全国人民的特务统治，各地先后陷入恐怖状态。

一五二一年武宗去世，他的堂弟朱厚熜即位——是为世宗。为缓和正德时期社会的紧张局势，巩固封建统治，世宗即位之初，颁布了一系列改良的政令，如派遣官员勘查皇庄、庄田，退还自正德以来侵占的民田，取消正德时京城内外的皇店，限制宦官专政，裁汰锦衣卫冒滥军校三万余人，杀掉武宗佞臣江淋、钱宁等。这些措施，多少缓和了当时的社会矛盾。因为新政遭到“奸豪贵倖”的反对，些微的改良，也不能彻底实行，不久，即弊政丛生，在过去黑暗腐朽政治的基础上，又进一步恶化了。

嘉靖以来，统治阶级的腐朽和政治的黑暗，突出地表现在内阁的纷争上。世宗以藩王入嗣帝位，多得力于以杨廷和为首的内阁官僚集团的拥护，因而此期内阁的权势，超越了明代前期，成为皇权有力的支柱。地主阶级政治集团争夺政权，自然想在政令重心的内阁取得地位，特别是取得内阁首辅的地位，所以内阁首辅地位

的争夺愈演愈烈。张璁攻倒杨廷和而为首辅，以大同兵变的责任，被夏言弹劾。夏氏入阁后，又被严嵩攻击而去职。其后徐阶攻击严嵩，高拱又攻击徐阶，张居正又攻击高拱，内阁的纷争直接形成了政治混乱的局面。

特别是严嵩入阁为首辅，他执行的政策给当时及后来造成不少恶果，给人民招致了深重的灾难。专权二十一年，大纳贿赂。户部岁发边饷，以十分之六馈送严嵩，十分之四输边。士卒失所，军卫破坏，海防废弛。文武将吏，多出严氏门下，官吏迁擢，唯贿是问。严嵩垮台后，发现与其子严世蕃历年收得的贿赂，竟有黄金三十万两，白银二百万两，其他珍宝器物无数。在江西的南昌、分宜、萍乡、宜春等地拥有大量房产和地产。严嵩当政时期任用的大批贪官污吏，更不知搜刮了多少民脂民膏。

当时各级官吏的腐败也使政治陷于麻痹混乱。“入官视事，循例取索”，一般官吏“假公用而科敛任情……文书非贿吏不行……”，一些司法机关则“权门之利害如响，富室之贿赂通神，钝口夺于佞词，人命轻于酷吏”。

明朝政府于嘉靖时期已很腐败，因为皇帝寄耳目于他的宦官特务，每日上朝理政已没有必要，也就索性不再上朝，不召见大臣。世宗一生最感兴趣的是崇拜仙道，妄求长生。土木祷祀之费，用无虚日，道士可做礼部尚书。生活荒淫奢侈，厨役多至五千六百余人，一般也在四千一百名左右。光禄寺供鹰、犬、鸟、虫的食肉，每年高达一万六千多斤，食米竟达五千二百多石。西苑养豹一只，用夫役二百四十人，岁廩二千八百余石。宫中为斋醮，每年用黄蜡二十余万斤，白蜡十余万斤，香品数十万斤。

嘉靖时期国家也十分困难，税收比建国初年减少，支出却大量增加，如一些宗室藩王子孙繁衍，禄米激增数十倍。嘉靖末年太仓存银不及十万两，岁出却超支一百四十多万两。财政陷入了绝境。

土地兼并在明代一直是个严重的问题。皇帝有皇庄，大地主

阶级凭藉自己的政治势力和经济力量吞并土地，一般的地主豪绅，也疯狂霸占土地，致使土地高度集中。不只大量民田被侵夺，军屯田也是他们劫夺的对象。官僚地主阶级占有大量土地，他们却利用封建特权或作弊手段，少承担甚至不承担赋税。宗室勋贵的赐田，有优免纳赋的特权，一般地主豪绅就贿通官吏，勾结里书，涂改册籍，隐匿田亩，把赋税转嫁到农民身上。由于皇帝、贵族地主的兼并和隐漏，官府册籍上登记的田亩日益减少，征收的田赋不但不减，反而有所增加，结果农民的田赋负担与岁俱增，农民的徭役负担也成倍增加。和隐漏田税一样，地主阶级勾结州县官吏、里书，涂改户籍，通过虚报死亡、隐瞒年龄等恶劣手段，把大户的力役负担转嫁到农民身上。

丧失土地的农民沦为官、私庄田里的佃户，承受着高额的地租剥削，“至有今日完租而明日乞贷者”，借贷的利息有“一倍至五倍者”。农民无法生活，只有逃亡。因此流民问题，也是一直困扰明朝统治者的社会问题。

嘉靖时期的边防力量也开始削弱。明朝军队是卫所制度，卫所的主要基础是军商屯田，军屯土地由于土地兼并，渐渐转为军官私人占有或庄田主手中，军粮的供应日少。军官克扣军饷，军士身受重赋、徭役、克扣之苦，无法生活，只得逃散。屯政的破坏与军士的逃亡，使卫所制度名存实亡。

一五四二年，俺答大举入侵，蹂躏的地方遍及十卫三十八州，杀掠人口二十余万，抢劫牛马牲畜二百余万头，金银财宝无算，焚毁民居八万户，使田地荒芜者数十万顷。但是腐败的统治者亦未接受教训，边防的废弛状况继续存在。

一五四七年，边帅曾铣建议加强国防，要收复被蒙古侵占的河套地区，以铲除“套寇”。还建议加强边墙的修筑、军队的训练和增加火器等，竟遭严嵩等人的反对。加以“好大喜功之心，而为穷兵黩武之举”之罪名，杀害。嘉靖二十七年九月，俺答进扰宣府。世

宗认为是因夏言、曾铣提出收复河套，俺答才来报复，又把夏言斩首。

嘉靖二十九年，俺答率部入侵大同，总兵张达战死。因贿赂严氏父子而得到宣、大总兵官的仇鸾，不懂军事，惶惧无策。面对俺答的进犯，只好以重贿收买，求他们不要进攻大同。俺答遂率兵东进从古北口入，时世宗正在西苑专心修炼，厌烦边防警报，兵部尚书丁汝夔不敢去打扰他，仅是申饬各镇须加强警备。但是明京兵大溃，俺答兵至通州，直逼京师，沿途大肆杀掠。城防兵把老弱残疾凑起来仅四、五万人，尚武器不全。各路援兵到者五万余人，怯懦不敢出战，坐视俺答兵烧杀抢劫。几天以后，押运大批男女、骡马金帛财宝，踌躇满志地引兵而去。此即“庚戌之变”。

嘉靖时期的外患不独“套寇”进犯，东南沿海还有倭寇的严重骚扰。明王朝既不合理地处理对外贸易关系，也不加强海防，使沿海人民深受倭患之苦。

十五世纪后期，日本进入战国时代(1467—1573)，各封建诸侯争权夺利，扩张势力范围，彼此征战不已，破坏了南北朝的对峙局面。北朝统一全国，南朝失败的政客、武士、浪人遂与商业资本结合形成海盗。还有一些嗜利的日本商人，由于明朝限制对外贸易，牟利无门，也成为海盗。这些人占据海岛，浪迹海洋，成群结伙，形成一股明目张胆侵扰大陆沿海的邪恶势力。于此同时，明帝国内部存在大批流民，流入沿海城市或跨出海外，进行海外贸易或从事海盗生涯。当时在沿海的贵官势豪或大姓船主，也勾引番船，与之往来。

嘉靖年间，由于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对外贸易也比较发达。除明政府控制的官方对外“朝贡”贸易外，沿海一带私人经营的海上贸易也很活跃。商人不顾朝廷海禁的命令，和“番舶夷商”相互贩卖货物，形成海上走私集团，甚至亡命海外，勾结倭寇。当明政府厉行海禁时，沿海的商人富豪，因商业利益受损，便和流窜

海上的海盗商人及倭寇相互联络，里应外合，进行掳掠抢劫。

倭患在嘉靖时期尤为猖獗，这和当时中国的政治、经济密切相关。明世宗的昏愤腐朽及严嵩的奸贪狠毒，特别是严嵩竟然庇护纵容通倭官僚，打击陷害抗倭将领，给抗倭造成极大的危害。

福建巡抚阮鹗与倭寇相通，案发后，以重金贿赂严嵩，免于治罪。相反，抗倭将领张经在嘉靖三十四年于浙江王江泾大败倭寇，取得抗倭以来的最大胜利，却因严氏奸党赵文华的诬蔑陷害，功罪颠倒，被逮捕处死。抗倭名将俞大猷不善阿谀奉承，同样受到严氏父子的陷害。严嵩的倒行逆施，使倭寇有机可乘，侵扰活动才日益猖獗。

明代倭患从洪武二年(1369)开始，嘉靖四十四年(1565)大陆上的倭寇才被肃清。

明世宗于嘉靖四十五年去世，穆宗、神宗相继即位。在隆庆、万历时期，社会问题严重且充满危机。首先是土地问题，皇、官庄及一般的土地兼并仍然继续发展。隆庆末年，南直隶有占田七万顷的大地主。因此，农民破产流亡的现象普遍于大江南北，社会秩序动荡。其次是财政问题，自中叶以后即时常濒于危机。症结是田赋因土地隐蔽与优免过多，还有钱粮积欠，国家支出则有增无减，如国防费大量增加，皇室贵族的消耗，官员的贪污中饱等。每年预算超支，无法弥补。第三是国防问题，明帝国无力加强国防，以积极地防御外患。

为了缓和社会矛盾，挽救帝国面临的危机，统治者不得不采取一系列的措施，政治家张居正成为中坚人物。张氏于隆庆元年(1569)入阁，一五七三年起为内阁首辅，开始实施其改革主张。他对内对外政策的纲领是：对内制止豪强兼并，均平赋役，清理土地与赋役制度，整顿税收，澄清吏治。对外要加强国防，清查边军积弊，积极训练并修筑坚固的国防线，储备国防费用。对内采取缓和社会矛盾，加强中央集权的方针。对外则积极防御。到万历九年

(1581),全国土地已经清丈,张居正开始全面推行“一条鞭法”,这时惟敏已去世三年了。

随着明朝中后期社会矛盾的激化,不仅政治危机严重,思想上也出现了危机,仅使用宋代的程朱理学作为哲学武器已远不能解决现实存在的问题,它支离庸弱,不足以振起人心,统治阶级内部的一些人,于是对理学产生了怀疑。他们为挽救和维护腐朽的封建统治阶级的伦理纲纪,就另辟蹊径,寻找新的麻醉人民的理论工具。生活在那一时代的王守仁,亲眼目睹官场的黑暗,痛切地感受到国家政权的腐败。作为统治阶级内部的一员,他起而“挽世道,救人心”,巩固封建统治,便在批判朱熹客观唯心论的基础上,结合自己一生的政治实践经验,建立了一整套主观唯心主义的哲学理论体系——“心学”。使其紧紧地控制人们的精神,从思想上配合他在军事、政治方面对人民的镇压,其主流是反动的。

王守仁哲学理论的主要学说,是首先从哲学体系上接受了陆九洲“心即理”的主观唯心主义学说,无论研究事物、认识事物,都从精神的原则出发。竭力夸大人的思维的能动作用,把客观事物的存在,统统归之于人的主观知觉作用的结果。他的认识论是“致知格物”。王氏的哲学终结是“良知”说,此说是以他的“心即理”说为前提的。王守仁把两宋理学加以发展,除“心即理”与“良知”外,更重要的是中国唯心主义哲学中的知与行的关系的理论。

此外,几乎与这一转变同时发生的是明代中后期社会文化思潮的新变。一种与理学相悖,充分肯定自我,充分肯定人情物欲的观念如狂飙突起,弥漫于整个社会。

这一观念与明代中后期城市经济的繁荣密切相关,反映了新兴市民的意识情趣与审美态度,故亦称为市民思潮。市民思潮的产生有力地促进了戏曲小说等通俗文学的发展,也给诗文创作带来了生气。明代前期思想文化沉闷的局面被打破了,出现了中后期文学艺术繁荣的新局面。

明中叶以后,随着城市经济的繁荣,市民社会进一步扩大,反映在意识形态领域里,人们便强烈地要求摆脱旧礼教的束缚,要求充分肯定人的正常欲望,发展个性,确认自我的价值。

王守仁学派后来繁衍出许多流派,有的影响较大,如“浙中王门”的王畿,和创立泰州学派的王艮。王畿一伙基本沿袭王守仁的主观唯心主义,又进一步玄学化了。王艮虽是唯心主义范畴的哲学家,但他与王守仁和王畿的观点是有出入的。由于王艮从社会下层群众的切身利益出发,哲学观点比较实际,含有浓厚的平民色彩,具有反道学的积极因素。王艮死后,颜山农、何心隐等人,都是王学左派的著名学者,聚徒讲学,公开批判道学,攻击孔孟儒学正统,反对封建礼教,痛诋八股,反抗腐朽官僚的贪虐残暴,再也不受王学所维护的封建名教的束缚。

这就是冯惟敏所处时代在政治、经济、军事、哲学思想等方面的基本情况,他的作品都深深地留有时代的印记。

第二章 冯惟敏的家世与生平

一 冯惟敏的家世

据《冯氏世录》记载，冯氏上世出自周文王第十五子毕公高，其后毕万食采邑于冯城，遂以“冯”为姓。自此以后，世变人迁，支派早不可考。

至元代中叶，有个名叫士安的生育六个儿子：思明、聪、公、平、问、敬，由此而子孙繁衍，但散居各处，也无世系可稽。

元末明初，临朐万户侯冯才兴有三个儿子：思忠、思福、思孝。当时朱元璋下诏，命令山东人每三户派一人戍守辽宁，思忠勇敢前往，安家于广宁（今北镇）左卫十三站五家屯。此后，思福移居临淄，思孝迁往江苏邳州（今邳县），兄弟星散。

思忠生儿子福通，福通又生四个儿子：春、俊、旺、兴。春生子振，振生子裕，裕公即惟敏之父。

冯裕（1479—1545），字伯顺，号闾山。以戍籍生于辽东广宁。少年为孤儿，靠叔祖母池氏养育成人。嗜读书，本家没有藏书，只得借读他人的书。听说义州（今义县）贺钦提倡理学，拜为师，在学习过程中多有所得，学业大进。弘治十七年中举，正德三年中进士。

起初，出任华亭（今上海市松江县）令，为官清慎正直，治务廉平。当时县里正闹水灾，老百姓的赋税本来就重，因田地被淹，农

民都为缴不起租而发愁，耽心不能自保。冯裕挑选上等田地代缴欠租的十分之一，受到人民的欢迎。但是，有的高官大吏据此诬蔑他欺年加赋，幸亏老百姓出面解释，才得真相大白。县里有个叫张文冕的，任宫廷近侍，是刘瑾的心腹。他在乡里骄横跋扈。曾把家业托付给冯裕，冯裕赴任后，并不加庇护。他气愤不过，便告诉刘瑾，刘瑾要逮捕冯裕。裕明知情势危急，但巍然不动。不久，刘瑾及其私党被治罪，此事才归于平静。

继而改任萧县县令。正德六年，为晋州知州。滹沱河自城北南移，城北的土地乾旱贫瘠，但赋税一仍其旧。冯裕到任，给百姓削减了赋额。

正德十年，调南京户部员外郎。凡出纳，冯裕一律参照法定条文，因此多次得罪权贵。权贵们便秘密派人侦察他的阙失，图谋加害于身，裕执法如故。权贵终年未能找到藉口，不得不叹服而去。渐升户部郎中。居南京十二年。

嘉靖六年，调甘肃平凉，任知府。一年后，改知石阡（今贵州省石阡县）。一次，少数民族间武斗，冯裕为他们调整了疆界，并按俗例合计杀伤人数予以赔偿，无所袒护，皆心悦诚服。在贵州先后七年，屡建功勋。有百余年仇杀者，先是廷议，复遣重臣按治，终不服。冯裕单车前往调停，一言而解。酋长感动得下泪，民众自动离散，从而得以安居。嘉靖十二年，擢贵州按察司副使，嘉靖十三年辞职归里。

冯裕当官亢直有裁断，所到之处尤多惠政，民怀去后之思。性格重厚刚介，他人不敢徇私舞弊。即使归田依然凛凛自守，非义一毫不染。曾说：“希宠者负君，媚人者负己，谋身者负人。”裕生平可谓“三无负”矣。居家亲仁善邻，有招饮即赴，每至酩酊大醉。不治产业，历官二十年，僦居十余载，家徒四壁，地无一垄。钱袋千瘪，缸无储粟，并不过问。晚年端坐陋室，仍手不释卷。同益都、寿光等地的退職官员结诗社，定期赋咏。其曾孙琦编辑八人之唱和为

《海岱会集》，入《四库全书》，又编其自作诗为《方伯集》，传于世。

卒于嘉靖二十五年，享年六十七岁。

冯惟敏兄弟七人，长兄惟健、次兄惟重、五弟惟讷，均知名于世。今略述其生平事迹。

惟健(1501—1553)，字汝强，号冶泉，又号陂门。生于辽宁。早年随宦南北，游学金陵。年纪尚轻，已渐有文名。才情骏发，弗徇时好，超然绝尘。同辈学子，无不倾慕。与陈元举、杨全卿、马承道、卢国贤等结文社，推为祭酒。自江南归青州后，人们看到他的文笔自成一格，认为野王再生、敬通复出，争相引重。摹其词句，拟其体裁，朴茂之俗，始趋藻雅。

嘉靖七年举于乡，孰料此后七上春官竟不第，齟齬于时。奇思健气，发为词章。可惜多是酬赠游衍之撰，因其志殆不仅以文人自命，且愿为当时输诚效节、著功业于春秋，继而抒意缀词成一家言，只是没有得到机会。他的诗赋有汉魏遗风，骚选多为近体，似开元天宝以上名家。他的书启诔赞诸体，超逸峻整，如出晋宋人口，皆成奇语。至于叙记诸篇，命意深厚，敷言尔雅，不类文士之词，尤其独树一帜，无一般人浮薄之习气。有人评其作品说：“奇思骏发，古选冲逸，近体严整，盖杰作也。”^①确是知人之论，一语中的。

其父告老还乡，囊橐羞涩不能自给，惟健主持家务，供养不乏。诸弟妹按时婚嫁。弟惟重客死合肥，时值岁末，惟健冒寒风踏冰雪办理丧事，又赶赴京邸迎其家眷，不胜操劳。

卒于嘉靖三十二年，享年五十三岁。

惟重(1504—1539)，字汝威，号芹泉。十岁即出口成章。读书数行俱下，有心得辄记之。二十岁递补辽左广宁卫庠生。幼年随宦，后随母定居青州，改为郡庠。丰颐修干，谈笑风生。嗜酒，斗许不乱。刻意赋诗，诗清新峻逸，无大历以后语。善书法，笔迹飘逸，

① 王兆云《皇明词林人物考》

得王氏笔意。齐鲁间拜为师者日众。

一日，其父对惟健兄弟说，每当我端起饭碗，即想起医无闾（辽左山名），先祖们都被安葬在那里。你们谁愿意去省墓？惟重请行。那时，外族人屡次犯边，路途险阻。惟重骑匹马穿行于烽火中，月余到达北镇。他铲除树木杂草，垒起围墙，植以荆棘，竖起石碑，圆满完成任务，返回青州。其父大喜。

嘉靖十三年中举，又五年登进士第。授行人司行人。翌年，世宗皇帝南狩，惟重为先行官，奉命告湖南湖北，奔波于烈暑中，到庐州（今合肥），背生毒疮，不治而逝。时方盛年——三十六岁。著《大行集》。

惟讷（1513—1572），字汝言，号少洲。六岁即书声琅琅如成人，人提问敢于对答。与仲兄同榜举人，同榜进士。

初为宜兴县令，捕治逋逃官租的豪绅，获金数万，郡守认为有才干，颇爱重。一次，部使者视察，惟讷因忙于他事，未能亲自招待。有人又乘机散布流言蜚语，部使者不快，遂调魏县。因筑城有功，升山西蒲州知州。嘉靖二十五年，迁扬州府同知。因父亲病故，回临朐，服除，改任松江督赋。旋拜南京户部员外郎，因事务不多，每日手不释卷。因母亲病逝，返乡服丧，服除，补兵部车驾郎。不久，出为陕西按察司金事，镇守陇右一带。惟讷上任即疏浚城隍，惩治贪官，平复政令，加强边疆戒备，计五年。边境清谧，人民得以安居乐业。转河南右参议，寻除浙江督学副使。浙地士人作风浮靡，惟讷到任即告诫他们，德行需敦厚，文风要端正，致使风气一变。再调山西参政、山西按察使、陕西右布政使。清理屯田，得万余顷，朝廷得到报告，特赐金币。累迁江西左布政使。所至之地皆有声迹。为官三十余年，图书诗卷外无长物。隆庆五年，以光禄卿告休。喜爱临朐海浮山之胜景，安家于彼，以著述为事。有《光